



毛泽东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鲜明态度

□ 康明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但对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发动的战争，第一条是反对，第二条是不怕，要准备以反侵略的战争应对侵略战争，以战争的胜利赢得和平，并且只有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才可能制止战争的爆发。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先后进行并赢得了6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奠定了大国的地位，争取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内外环境。

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将以和平友好的姿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毛泽东也多次指出，我们希望和平的环境，反对新的战争，但是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也绝不害怕，坚持以战争反对战争。他在1953年9月12日指出，我们不是去侵略别人，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1956年1月，在修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政治报告稿时他又再次强调：“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在阐明赞成和平与不怕战争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对战争要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指出，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可以看出，热爱和平必然反对战争，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惧怕战争则表现了决不向任何压力屈服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还辩证地分析了怕与不怕的关系，他指出，“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说不怕，是说一旦战争来临，我们能够打，而且能够打赢，说怕，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实力很强的帝国主义，一旦打起来，损失难免，弄得不好，可能要付出巨大牺牲。1957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讲：“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因此，他反复告诫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抱幻想，要估计到“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要

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做好战备工作。立足最困难的情况加强战争准备工作。毛泽东始终强调，对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对可能发生的困难，要有准备，这样才能恰当地应付复杂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可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上，毛泽东认为突然袭击是帝国主义最有可能使用的发动战争的手段。1955年3月，他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党内形势后，提出我们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因为“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并提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此后，他在1957年又强调“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并在1965年连续提出“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立足最困难的情况加强战争准备工作”“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等等。根据这些思想，中共中央明确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决策。这些也唤起了人民充分的精神准备，而迅速掀起的战备高潮特别是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对于制止战争的发生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从最坏的可能性来着想不是消极悲观，正如周恩来所指出：“事情都有主从两种可能，我们总是立足于最坏的可能，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实现，这是辩证地看问题。”

给敌人的打击愈痛，和谈才愈有可能。毛泽东一贯坚持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辩证法，指出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互对立，

相互转化，能战方能言和，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也只有具备打赢的能力，才可能制止潜在战争的爆发。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反动派和谈幌子下积极准备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就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必须击败他们的进攻，才能创造转到和平阶段的有利条件，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1951年7月15日，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清楚地阐明了战与和的辩证关系：“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

毛泽东还进一步深化了对战争与和平转化规律的认识。他在1953年11月23日的一封电报中谈到，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会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1958年3月，他在尖锐批判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机械观点时又指出：“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正如列宁也曾鲜明指出：“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来讲和。”由此可见，马克思官兵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高度统一的，态

度也是高度一致的。

在时间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毛泽东在他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中，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最终指导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持久作战也成为反对敌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一个需要100年乃至几百年的长期历史过程。所以，“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宣告：“我们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霸道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做好持久斗争的准备，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帝国主义是打着和平的幌子在准备战争，对此绝不能麻痹大意，要在思想上持久地保持高度警惕。他在1959年10月18日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整个国际形势在好转，主要是因为西方统治集团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所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他特别提醒人们，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资产阶级使形势有所缓和是一手，另一手是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而“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的几封关键来电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发扬敢打必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孟良崮进行了一场山地运动歼灭战，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

1947年3月，国民党开始实施“黄河战略”，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开始转战陕北。在山东方向，国民党军的兵力达24个整编师，总计455万人；我军华野共9个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总计27万人。

5月3日华野电报中央，准备南渡3个纵队（第1、6、7纵）分兵南下。毛泽东历来重视集中兵力。5月4日，毛泽东复电华野：“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不到200字的回电中，毛泽东三次强调“忍耐”“耐心”。5月6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华野：“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5月10日，面对解放军再次主动后退，国民党判断华野“攻势疲惫”，汤恩伯立即发布命令，以张灵甫第74师、黄百韬第25师为主攻，限令12日直取华野总部所在地坦埠。5月12日，毛泽东来电：“敌5军、11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5月13日，粟裕决心集中主力歼灭第74师，当晚开始行动。14日华野全线发起总攻。当日，毛泽东致电华野：“歼击74师极为正确。”正是毛泽东上述重要及时来电，反复叮嘱不要分兵，集中兵力，忍耐待机，充分信任“不遥制”，使得陈毅、粟裕临场决断，放手一搏，最终全歼第74师。

奇正用兵孟良崮

5月10日，国民党军推进到莱芜、新泰、蒙阴一线。敌军在24个师中，集中了17个师进攻鲁中山区，目标直指华野总部坦埠。其中，第74师居中，稍稍突出，第25师居左，第83师居右。

粟裕认为国民党军采用中间突破的方式，直接攻击华野总部，来势凶猛。虽然总体上我军仍处劣势，但74师正处于我军正面，不需过多调整我军即可在局部对74师形成5:1的兵力优势。数月来苦寻战机竟在眼前。粟裕决定采用“猛虎掏心”的战法，出其不意，用中间突破对中间突破打掉第74师，即以陶勇和许世友的第4、第9两个纵队正面攻击；以叶飞的第1纵队插入第74师左翼，切断74师与25师的联系，阻击第65师，从左侧后攻击第74师；以王建安的第8纵队插入第74师右翼，切断其与第83师的联系，从右侧后后进行攻击；隐蔽在鲁南的王必成第6纵队，昼夜飞兵急驰130公里山路，北上袭占垛庄，堵敌南逃，完成合围。

陈毅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粟裕命令各纵队“集中力量歼灭74师，宁可放走25师全部，不能放走74师一个连”。

只有强大的对手才能造就出更强大的胜利者，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舍弱打强，体现了战场上强弱双方的辩证哲学，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真谛。华野跟第74师一直是死敌，全军上下对该敌早有灭此朝食之强烈想法。在苏北时粟裕就曾两次考虑围歼第74师未果。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到孟良崮粟裕把他从国民党军进攻集团中“剜”出来打，已经是第三次了。战后一直有人说张灵甫奔路上山，犯了兵家大忌，否则可以突围逃生。实际上无论是否上山，面对智将粟裕、面对众志成城在华野将士，还有百万沂蒙百姓的舍命相助，张灵甫和他的第74师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战后叶飞总结认为，第74师上山出乎粟裕预料，干扰了粟裕的原定部署，第74师因此多支撑了两天，否则按原定计划，华野将运动中设有防御阵地的第74师压在孟良崮以北山谷下切割，居高临下冲击围歼，最多不会超过5小时。

一夜之间，华野5个纵队像汹涌的怒涛一样将第74师淹没在重重围困之中，而在国外，国民党军又以10个整编师（军）包围着华野，孟良崮战场上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态势。如果华野不能在预定的短时间内歼灭第74师，则有被国民党军围歼的巨大危

『意义极大』的孟良崮战役

□ 李雪东

险。15日13时，华野各部下定最大决心，从四面八方向74师展开潮水般猛烈压缩攻击，由于是仰攻，攻击部队打得十分惨烈。在最后总攻时刻，为了快速应变，粟裕命令前方各纵队统一交由叶飞指挥。16日18时许，华野终于攻克大崮顶，击毙张灵甫。经过3天激战，华野全歼第74师和第83师一个团，总计32万人。5月17日，毛泽东特发贺电：“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

用兵之法，要在应变。孟良崮战役中，粟裕以中央突破对敌之中央突破，以攻对攻，选第74师祭旗，大出敌军所料，最终出奇制胜。孟良崮大捷震动全国。新华社特表《祝蒙阴大捷》的评论，孟良崮战役一举扭转了我山东解放区面对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不利局面。一名被俘的第74师营长说“74师被歼灭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国民党）部队能抵抗解放军了。”蒋介石哀叹：“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蒙山高，沂水长

在孟良崮随处可以听到《沂蒙颂》，曲调悠扬，歌词字字讴歌着沂蒙精神。孟良崮战役中，车轮滚滚，担架如林，沂蒙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民工人数与部队人数之比达到37:1。出现了“沂蒙红嫂”用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抚养革命后代，沂蒙妇女勇架火线桥，“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动人场面。陈毅曾深情感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民。”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临沂时指出：“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不胜、无敌于天下。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力量，正是人民军队铭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永远不变的军魂，牢记兵民是胜利之本，万众一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



真担当才能够真减负

□ 张晓丽

“五多”问题是形式主义作祟、官僚主义作梗，困扰基层已久，层层反复强调，为何难难纠治，固然与其内在的隐性、复杂性、反复性和顽固性有关，但从根本上说，与个别领导干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想担责不无关联。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简单的作风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是不坚持政治原则、不遵守政治纪律的外在表现，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危害极大。它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损害党中央权威，离散党群关系，破坏集中统一。彻底消除基层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最大限度地聚力备战打仗，中央关注、统帅关切、官兵关心。把减负问题作为重要任务摆到位、抓到底，事关战力生成、兵心凝聚和备战效能，其体现的是作风、关乎的是忠诚、考验的是担当。

真担当就必须严法度。法规制度既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遵循，

也是有效杜绝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解困的有效办法。必须严格遵守业已建立的制度规范，坚持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上下联动、持续用力，从会议瘦身、文电精简、工作组合并等事项做起，树立靶标，瞄准靶向。找到靶点，紧盯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立说立行、立纠立改、立竿见影，以严肃规范的计划性、前瞻性，确保各项工作统一部署、统一协调、统一行动，不打乱仗。

真担当就必须正心思。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挤去工作中的水分，排除备战打仗的虚光，防止形式主义滋生蔓延，把心思精力聚焦于主责主业。这就要求我们在抓建基层时，坚持用是否有利于基层建设的发展、有利于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有利于官兵实际问题的解决来衡量和检验自身工作。不仅要把减负真真切切看在眼里、紧盯不放，还要刻在心里、印在脑中、抓在手上，切实把形式主义当“过街老

鼠”，举起棍子穷追猛打，不见成效不撒手。从一文一会抓起，从一人一事改起，少些“作秀式调研”、多些“实打实指导”，少些“起哄式造势”、多些“实打实落实”，切实把紧每个关口，关闭每道闸门，不让一丝不良风气透进工作、渗入基层。

真担当就必须祛虚花。虚花结不出果实，花枪敌不过真枪。在抓备战打仗的过程中，要多反思评判哪些工作是助力备战打仗的，哪些工作是干扰备战打仗的。对那些无益于备战打仗的工作下决心做好“减法”，真正把不必下发的文电、不必召开的会议、不必开展的检查和不必要组织的活动减掉，层层卸包袱、层层减压力，让基层官兵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激发基层官兵崇尚实干、敢于担当、狠抓落实的精气神，做到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全面提升能打仗打胜仗能力。

真担当就必须使长劲。始终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扛在肩

